

共產主義烏托邦幽影徘徊不散

——論王晉康《蟻生》的反烏托邦書寫

鄒 文 律*

提 要

在中國當代文學與歷史的互動中，「反烏托邦書寫」經常是被忽略的文學表現形式。然而，反烏托邦書寫卻呈現了中國作家對毛澤東時代烏托邦運動的省思。被譽為中國科幻界「三巨頭」之一的王晉康，於2007年出版的《蟻生》書寫了一場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失敗的烏托邦實驗，展現了作者對烏托邦追求的警剔。王晉生自言《蟻生》是他最為滿意的小說，但學術界對這部小說的探討不多。本文旨在深入分析《蟻生》的反烏托邦書寫。全文共分為四部分：第一部分探析《蟻生》呈現的烏托邦與共產主義烏托邦的關連。第二部分則詳細分析《蟻生》對烏托邦預設的批判。第三部分則析論《蟻生》怎樣綰合了對文革和烏托邦追求的雙重否定。第四部分關注小說如何展現對後毛澤東時期，烏托邦幽影不散的警剔。

關鍵詞：反烏托邦、文化大革命、王晉康、科幻小說、中國當代文學

本文於107.09.10收稿，108.03.06審查通過。

* 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語文及通識教育學院副教授。

DOI:10.6281/NTUCL.201903_(64).0004

The Communist Utopian Shadow Lingers: On the Anti-utopia Style of Expression in Jinkang Wang's *Life of Ant*

Chau, Man-Lut*

Abstract

In the interac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and history, the anti-utopia style of expression is frequently neglected in literature. The anti-utopia style of expression is the reflection of Mao Zedong's Utopia Movement from the Chinese authors. Jinkang Wang is one of the Big Three in Chinese Science Fiction. His fiction, *Life of Ant*, is his most prominent work of anti-utopia style of expression. This article aims at examining the anti-utopia style of expression in *Life of Ant*. It contains four parts: The first part discusse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utopianism in *Life of Ant* and communism. The second part analyzes the critics of utopia presupposition in *Life of Ant*. The third part examines how the author disavows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utopianism. The fourth part demonstrates how the fiction carries the vigilance about the shadow of utopia under post-Mao era. The anti-utopia style of expression is the reflection of Wang towards Mao Zedong's Utopia Movement. It implies that the reality of utopianism is cruel and impractical.

Keywords: Anti-utopia, Cultural Revolution, Wang Jinkang, Science fiction,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General Education and Languages, The Technological and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e of Hong Kong.

共產主義烏托邦幽影徘徊不散

——論王晉康《蟻生》的反烏托邦書寫*

鄒 文 律

一、前 言

1977 年 8 月於北京召開的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上，中國共產黨宣布歷時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劃上句號，正式拉開了後毛澤東時期的序幕。莫里斯·邁斯納（Maurice Meisner）形容當中的關鍵性改變：「現代經濟發展目標取代了馬克思主義關於共產主義烏托邦的幻想」。¹「他們必須拋棄毛主義的烏托邦，才會有助於建設一個強大而繁榮的國家」。²共產主義烏托邦的社會目標被摒棄，經濟發展成為整體中國社會的首務。烏托邦運動退潮之時，文學界開始反思毛澤東為了實現共產主義烏托邦而發動的社會政治運動（例如「大躍進」、「文革」）。「傷痕文學」、「反思文學」、「尋根文學」、「先鋒小說」相繼湧現，構成了 1980 年代的文學主潮。到了 1990 年代，隨著中國社會持續推進改革開

* 本論文為 Thei Seed Grant: “Utopia in China: A research on Wang Jinkang's science fiction”（計劃編號：SG1617118）的研究成果之一。本文初稿最先於 2018 年 11 月 10 日首次宣讀於香港恒生大學主辦的「中國傳統的創造性轉化：中國文學國際研討會」，修訂稿再於 2019 年 3 月 15 日於香港公開大學主辦的「全球背景下的中國文化國際學術會議：二十一世紀中國文化與國際視野」上宣讀。承蒙與會學者以及兩位匿名審查人惠賜寶貴意見，謹此銘謝。

¹（美）莫里斯·邁斯納（Maurice Mesiner）著，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譯：《毛澤東與馬克思、烏托邦主義》（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 年），頁 3。

²（美）麥克法夸爾、（瑞典）沈邁克（Roderick MacFarquhar & Michael Schoenhals）著，關心譯：《毛澤東最後的革命》（臺北：左岸文化公司，2009 年），頁 21。

放，市場經濟不斷發展，中國當代文學亦進入了多元發展的時期，延續至今。

在文學與歷史的互動中，有一個面向時常缺席於文學史——這些小說以「反烏托邦」書寫（Anti-utopia Writing）為主要的文學表現形式，映現了作家對中共追求實現共產主義烏托邦的歷史回顧，同時以文字深入反省烏托邦運動的本質。這類型的反烏托邦書寫始於莫應豐《桃源夢》（1985），小說以烏托邦「天外天」的消亡來批判「文革」烏托邦運動造成的災難。其後，閻連科《受活》（2004）在批判「文革」之餘，同時批判後毛澤東時期社會以「集體一朝致富」的手段來實現共產主義烏托邦的虛妄追求。格非的「烏托邦三部曲」（又名「江南三部曲」）以反烏托邦為基調，試圖以三部長篇小說來批判中國百年的烏托邦夢魘，覆蓋了晚清至民初（《人面桃花》，2004）、1950年代「大躍進」（《山河入夢》，2007）、後毛澤東時期（《春盡江南》，2011），詳細描述主要角色為了創建烏托邦引致的種種災難，不少情節指向烏托邦運動在理念追求與實踐之間的落差，以及烏托邦運動失敗後，社會失去集體目標的迷惘和失落氛圍。從時間軸來看，中國當代文學的反烏托邦書寫始於對「文革」的反思，後來逐漸擴闊至晚清以來在中國大陸縈繞不散的各種烏托邦追求，尤其對追求實現共產主義烏托邦的過程裏，付出的各種代價和犧牲，以及實現共產主義烏托邦的不可能性。³

在這些反烏托邦書寫中，王晉康於2007年出版的《蟻生》格外值得注意。

³ 探討莫應豐《桃源夢》、閻連科《受活》、格非《山河入夢》的「反烏托邦」書寫之研究，可見鄒文律：〈桃源夢魘——論莫應豐《桃源夢》的「惡托邦」書寫〉，《中央大學人文學報》第47期（2011年），頁103-162；吳曉東：〈中國文學中的鄉土烏托邦及其幻滅〉，《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43卷第1期（2006年），頁74-81；劉劍梅著，杜紅譯：〈徘徊在記憶與「坐忘」之間〉，《當代作家評論》第1期（2008年），頁119-131；鄒文律：〈逸出烏托邦之外——論閻連科《受活》的反烏托邦書寫〉，《中國文學學報》第8期（2017年），頁151-186；姬志海：〈論《江南三部曲》的「烏托邦」反思〉，《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第3期（2017年），頁191-201；陳雀倩：〈烏托邦構設的真實與失落——論格非《山河入夢》之意義〉，《人文社會與醫療學刊》第1期（2014年），頁149-171。

王晉康寫作多年，⁴以寫作科幻小說著稱；在中國科幻文學領域更被譽為「三巨頭」（Big Three）之一。⁵文學界歷來多數把王晉康的小說置入中國科幻文學的脈絡加以討論；⁶例如韓松便指出王晉康的科幻小說關心科學與道德的關係，關心民族和人類的走向；⁷趙海虹則認為王晉康的小說對醫學、生物倫理學、科技對人性的異化等方面皆有獨特見解。⁸宋明煒在析論王晉康小說時，亦把他與劉慈欣和韓松的科幻小說並置討論，認為這三位科幻作家的小說觸及烏托邦議題時，呈現了對中國崛起、發展迷思、後人類視角的思考。⁹誠然，烏托邦與反烏托邦是科幻文學常見的主題，達科·蘇恩文（Darko Suvin）論及，科幻小說與烏托邦小說關係密切，科幻小說的範圍在當今雖然大大擴展，但它是間接地從烏托邦小說衍生而來的；科幻小說可以以包含烏托邦／反烏托邦書寫的維度。¹⁰宋明煒在討論中國科幻小說中的新浪潮時，便以《蟻生》與劉慈欣的網路小說《中國 2185》（1989）、《三體》三部曲並置討論，指出它們

⁴ 王晉康（1948-），河南南陽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曾任南陽油田石油機械廠研究所副所長，高級工程師。他在 1993 年開始創作，獲得中國科幻大獎銀河獎 15 次；著有《生死平衡》、《逃出母宇宙》、《蟻生》等長篇小說逾 10 部，〈養蜂人〉、〈水星播種〉等短篇小說 80 多篇。詳見（美）Mingwei Song, “Variations on Utopia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Science Fiction,” *Science Fiction Studies*, 40 (2013), pp. 86-102.

⁵ Mingwei Song, “Variations on Utopia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Science Fiction,” p. 87.

⁶ 例如王衛英主編的《中國科幻的思想者——王晉康科幻創作研究文集》（上海：科學普及出版社，2016 年），收錄了大量從科幻文學角度來研究王晉康小說的評論與學術論文。

⁷ 韓松：〈王晉康——真善美的求索者〉，收在王衛英編：《中國科幻的思想者——王晉康科幻創作研究文集》，頁 42-43。

⁸ 趙海虹：〈王晉康——中國科幻的思想者〉，收在王衛英編：《中國科幻的思想者——王晉康科幻創作研究文集》，頁 97。

⁹ Mingwei Song, “Variations on Utopia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Science Fiction,” p. 87. 宋明煒在此文主要探討王晉康〈轉生的巨人〉與發展迷思（the myth of development）的關連，對於《蟻生》僅略加討論，指出它對毛澤東發動的社會革命有所反映。

¹⁰ （美）Darko Suvin, *Metamorphoses of Science Fiction: On the Poetics and History of a Literary Genre* (Oxford: Peter Lang, 2016), p. 76.

與晚清科幻小說中的烏托邦主題顯著不同：晚清科幻小說「把烏托邦具象化為在科學、道德和政治上舉頭並進的未來景觀」，中國科幻小說中的新浪潮則因為 1989 年天安門事件以悲劇告終，呈現了一種「包含著希望與絕望，烏托邦及其惡托邦反思，民族主義和世界主義的混合雜糅。」¹¹ 宋明煒把《蟻生》置入中國科幻文學的脈絡中考察，並以 1989 年為中國科幻小說想像新模式出現的界線，自是有其創見。不過，誠如前文所述，中國當代文學亦有以反烏托邦書寫的形式，回顧毛澤東時代的共產主義烏托邦追求及其失敗的寫作脈絡。本文的論述由此而起，試圖把《蟻生》置入中國當代文學的反烏托邦書寫序列中加以探討，析論其反烏托邦書寫的文學意義。

《蟻生》描繪「文革」期間，地處湖北附近的北陰市舊城縣紅星公社知青農場發生的一場烏托邦實驗。主角顏哲運用父親遺留的「利他素」，試圖把充滿權謀詭計、爾虞我詐的農場，改造成人人「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烏托邦。可惜好景不長，隨著「利他素」不為顏哲預知的副作用陸續浮現，加上顏哲無法克服自身的人性弱點，整場烏托邦實驗終究以災難告終。小說既然書寫一場失敗的烏托邦實驗，論者亦多從反烏托邦角度來評論。徐彥利認為它是「反烏托邦寓言」，旨在反對非理性的強權統治和假理性之名剝奪人類自由的強權科學，顯示王晉康對個體人性的深度追索。¹² 宋明煒則認為《蟻生》具有「惡托邦」（Dystopia）小說的色彩，內容描繪的烏托邦實驗乃是當時中國烏托邦實驗（「文革」）的縮影，回應了「文革」期間發生的翻天覆地的社會改造，¹³ 亦

¹¹ 宋明煒著，王振譯：〈1989 年以後：中國科幻新浪潮的烏托邦變奏〉，《中國現代文學》（2016 年 12 月號，總 30 期），頁 64。

¹² 徐彥利：〈「烏托邦」覆滅後的人性探索——評王晉康《蟻生》〉，收在王衛英編：《中國科幻的思想者——王晉康科幻創作研究文集》，頁 210-211。另，沙媛媛也認為《蟻生》是一部「反烏托邦寓言」，講述了一個烏托邦走向幻滅的故事。見沙媛媛：〈《蟻生》：一部反烏托邦的寓言〉，《文學教育（上）》第 8 期（2013 年），頁 144-145。

¹³ 宋明煒：〈「烏托邦」實驗場〉，收在王衛英編：《中國科幻的思想者——王晉康科幻創作研究文集》，頁 210-211。

能見出王晉康對毛式烏托邦實驗的反思。¹⁴ 前述評論對於理解這部王晉康自言最滿意的小說固然有所幫助，¹⁵ 但論者未有深究的是，顏哲發動的這場烏托邦實驗，呈現了哪些烏托邦追求？《蟻生》的反烏托邦書寫批判了哪些烏托邦預設（構成烏托邦的基本預設）？為什麼王晉康要寫一場發生於烏托邦運動（「文革」）中的烏托邦實驗？王晉康怎樣借助《蟻生》表達了對後毛時期久久不散的烏托邦幽影之警惕？《蟻生》與後毛時期中國其他反烏托邦小說形成了怎樣的關係？本文將會圍繞上述問題開展論述。

二、《蟻生》呈現的共產主義烏托邦

本文在開展進一步分析前，先解釋何謂「烏托邦」。「烏托邦」一詞最初由英國人托馬斯·摩爾（Thomas More）於 1516 年所創，用以命名他當年出版的拉丁語著作。《烏托邦》一書分成兩部分，根據克里尚·庫瑪（Krishan Kumar）考察，拉丁文“Utopia”根據晚期希臘文的模式所創製，由兩個希臘文字根“ou”和“topos”組成，“ia”則是當中隱含的字尾。“ou”是「沒有」（not）的意思，“topos”則指一處地方（a place），合起來就是「不存在的地方」。不過，希臘文另有一個字根“eu”，發音和“ou”相同，而“eu”則是「美好」（good or well）的意思。職是，烏托邦既可以指一處「不存在的地方」，又可以指「美好的地方」。¹⁶ 謝江平指出，「在烏托邦所描繪的人類圖景中，一切社會矛盾都得到了徹底的解決。」¹⁷ 烏托邦是一切歷史階段的最佳圖景，是人類社會的終極解決方案，一勞而永逸。值得注意的是，《烏托邦》全書分為兩

¹⁴ 宋明煒著，王振譯：〈1989 年以後：中國科幻新浪潮的烏托邦變奏〉，頁 67。

¹⁵ 王晉康：〈《蟻生》創作談〉，收入王衛英編：《中國科幻的思想者——王晉康科幻創作研究文集》，頁 429。

¹⁶ （英）Krishan Kumar, *Utopianism*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108.

¹⁷ 謝江平：《反烏托邦思想的哲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 年），頁 21。

部分：第一部分描繪英國農民悲慘境遇和英國的黑暗政治；第二部分則描述一個理想國家。全書以一反一正的鮮明對比，帶出摩爾對當日社會現實的不滿，以及作者對當日何謂英國最佳的政治社會制度之想像。

隨著卡爾·馬克思（Karl Max）在《哥達綱領批判》（*Critique of Gotha Program*）構想的「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高階段共產主義社會，¹⁸ 成為毛澤東領導的中共致力在中國實現的政治追求後，毛澤東接連發動「大躍進」和「文革」等社會政治運動，意圖早日實現共產主義社會。事與願違，這些社會政治運動莫不在犧牲無數生靈後，以慘敗告終。學者（例如邁斯納）開始以「烏托邦運動」來命名中共這段歷史時期的政治實踐，並以「共產主義烏托邦」（Communist Utopia）來形容毛澤東致力創建的理想社會。¹⁹

在「文革」這場烏托邦運動進行中的 1968 年，毛澤東在「文革」期間發動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大批原來居住於城鎮的青年學生，不管出於自願還是被逼，紛紛移居農村參與勞動。《蟻生》描繪的知青農場便是由下鄉知青和老農共同組成的生產單位。農場位置偏僻，生活其中的知青和農場外的村民往來不多；老農則來自其他人民公社，與本地村民並不熟悉。知青農場的對外聯繫，只靠一條接駁至「知青辦」的廣播線和電話線。²⁰ 從小說的這種地理設定可以看出，地理阻隔性令知青農場具備了「空間性的烏托邦」特色。²¹ 顏哲，

¹⁸ （德）馬克思（Karl Max）著，何思敬、徐冰譯：《哥達綱領批判》（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年），頁 22。

¹⁹ 莫里斯·邁斯納（Maurice Meisner）認為「大躍進」、「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都具有烏托邦運動的色彩。詳見莫里斯·邁斯納：《毛澤東與馬克思、烏托邦主義》。當然，為「大躍進」、「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冠以烏托邦運動之名，乃後人所為。毛澤東及當時參與運動的人，絕不會承認自己追求的目標是一個具有空想性質的烏托邦。

²⁰ 王晉康：〈《蟻生》創作談〉，《中國科幻的思想者——王晉康科幻創作研究文集》，頁 116-117。

²¹ 何冠驥：〈幸福保證的謊言——論烏托邦的真面目〉，載何冠驥：《借鏡與類比——中國文學研究的現代化》（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9 年），頁 252。

這位 20 歲的青年學生便希望在這個「相對孤立的社會系統」中進行一場足以改變人類社會進程的烏托邦實驗。²² 饒有意味的是，如果「文革」本身便是一場「敢教日月換新天」的「烏托邦運動」，顏哲為什麼想要／需要進行另一場烏托邦實驗？

答案需要由顏哲在「文革」的經歷中尋找。顏哲的父親顏夫之是留英生物學家，對昆蟲學，特別是螞蟻的社會組織有深入研究。中共建國後，顏夫之懷著復興祖國的宏願從英國回到中國，卻在「反右運動」（1957）時被打成右派，²³ 後來更在「文革」中不堪迫害而自殺，其妻子亦步其後塵。²⁴ 父母雙亡後，顏哲好不容易走過生命的低谷，加入知青農場。知青農場生活不僅艱苦，成員的道德水平亦大有問題——幹活時偷懶、吃飯時賴飯票、爭逐權位……更令顏哲氣憤的是，他發現了農場場長賴安勝誘姦女知青。²⁵ 得悉顏哲掌握了自己罪證的賴安勝為了自保，對顏哲動了殺機，指使人加害他。誠如羅素·雅各比（Russell Jacoby）所言：「如果沒有一種具體的狀況來供它否定，烏托邦衝動就會顯得模糊不清」。²⁶ 親歷「文革」的顏哲發現，「文革」不單無法培育出實現烏托邦所需要的「新人」，還激發了人性中的各種「惡」。顏哲深切明白到惟有根除人心裏的「惡」，人才能真正過上輕鬆快樂的生活。²⁷ 弗雷德里克·詹姆遜（Frederic Jameson）的洞見提醒我們，烏托邦世界「涉及如何用這種或那種方法鏟除世界的『罪惡之源』」。²⁸ 在《蟻生》裏，人的「罪惡之源」

²² 王晉康：〈《蟻生》創作談〉，《中國科幻的思想者——王晉康科幻創作研究文集》，頁 116。

²³ 同前註，頁 23-24。

²⁴ 同前註，頁 87-88。

²⁵ 同前註，頁 55。

²⁶ （美）拉塞爾·雅各比（Jacoby Russell）著，姚建彬等譯：《不完美的圖像——反烏托邦時代的烏托邦思想》（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 年），頁 195。

²⁷ 王晉康：《蟻生》（北京：電子工業出版社，2013 年），頁 136。

²⁸ （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遜（Fredric Jameson）：〈烏托邦和實際存在〉，收在王逢振主編：《詹姆遜文集第 3 卷：文化研究和政治意識》（北京：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 年），頁 371。

便是「私心」——這種「私心」造成了知青農場的種種問題，例如崔振生幹活時不使盡全力、陳秀寬吃飯時賴飯票、²⁹ 賴安勝對顏哲動殺機……要鏟除「罪惡之源」，以毛澤東思想來與「私心」進行鬥爭（鬥私）顯然不奏效，必須借助科技的力量——使用顏夫之發明的「利他素」來改造人性。

「利他素」（小說有時稱之為「蟻素」）提煉自螞蟻身上的信息素。根據顏夫之的研究，螞蟻擁有利他天性，分泌的信息素可以在蟻群中產生正反饋，產生類似磁場那樣的無形的場，讓接受信息素的螞蟻擁有穩固的利他主義。³⁰ 顏夫之在去世前已經掌握了提煉信息素的方法，並把製成品留給顏哲。顏夫之對「利他素」的全面效果尚未掌握，故此要求顏哲發誓一輩子也不把它投入實用。³¹ 然而，顏哲認為時不我待，打算以「利他素」來改造包括賴安勝在內的全體知青農場成員，一舉把他們改造成擁有利他天性的新人。

對於「利他」的追求和「私心」的否定，充分見於顏哲噴灑「利他素」時向農場成員所說的話：

請把我給予的利他素納入心底，拋棄私欲，拋棄惡念，世上唯有勞動最快樂，利他最快樂。³²

毛澤東早在〈紀念白求恩〉（1939）便提出了「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精神」為「真正共產主義者的精神」，³³ 大權在握後他則試圖透過「烏托邦運動」（建立「人民公社」、發動「文革」）來培育出這種「真正共產主義者」，好通過他們來實現共產主義烏托邦。從前述引文可見，顏哲的烏托邦追求與毛澤東驚人地一致——通過培育無私的新人（「拋棄私欲」，「利他最快樂」），消滅體腦差別帶來的社會分工（「勞動最快樂」），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來實現共產

²⁹ 王晉康：《蟻生》，頁136。

³⁰ 同前註，頁114。

³¹ 同前註，頁116。

³² 同前註，頁139。

³³ 毛澤東：〈紀念白求恩〉，收在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頁620。

主義烏托邦。事實上，這種對「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強調，與及「鬥私」、「破私立公」等崇高理想，溯其根本，實乃源自中國傳統儒家「公私義利之辨」、「天理人欲之分」等文化心理。³⁴

顏哲與毛澤東，甚或儒家先哲的分歧不在於對烏托邦的價值理念看法不同，而在於除去「私心」的方法。顏哲不相信教化（「克己復禮為仁」），³⁵也不相信「群眾的革命能動性和他們具有自覺追求並實施共產主義目標的決心」。³⁶顏哲相信的是科技手段——他要借助「利他素」來徹底改造和控制人性，把無私利他的價值觀直接內化在人性中，並使之佔有主導地位。

「利他素」不單除去了農場成員的「私心」，還把農場變成一個「各取所需」的烏托邦。當知青農場舉行全場大會評工記分時，人人都無私發言，不願多評工分。後來，大家甚至接納成員王全忠的建議，³⁷從今以後不評工分，分紅按人頭計算，並設立一筆公益金，讓大家各自按需要取用。存放公益金的箱子沒上鎖，取用款項也不必預先得到批准。曾經取用公益金的人，皆主動留下記錄在箱子裏。³⁸公益金的設立，暗示了一種「各取所需」的制度——黃瞎子得以取錢買蚊帳、陳秀寬得以取錢治淋病，老初得以取錢為兒子治病——各人按自己的實際需要在箱子取錢使用，不必任何人批准。³⁹馬克思預告，要達到「各取所需」的境界，生產力必須得到解放，「在合作的財富底源泉更豐富地湧流出來之後」才能實現。⁴⁰「各取所需」是毛澤東發動「烏托邦運動」所欲

³⁴ 李澤厚：《中國現代思想史論》（臺北：三民出版社，1996年），頁207。

³⁵ 楊伯峻譯注：《論語譯注》（臺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2年），頁123。

³⁶ 邁斯納指出，毛澤東之所以堅信共產主義必定實現，乃是「以在建立共產主義物質前提的同時，相信群眾的革命能動性和他們具有自覺追求並實施共產主義目標的決心的信心為基礎的」；故此，只有在群眾自覺地追求馬克思主義目標，普及正確的價值觀並使之內在化，共產主義才會實現。詳見莫里斯·邁斯納：《毛澤東與馬克思、烏托邦主義》，頁126-128。

³⁷ 王晉康：《蟻生》，頁212-216。

³⁸ 同前註，頁235。

³⁹ 同前註，頁235。

⁴⁰ 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頁22。

追求的終極目標。毛澤東念茲在茲卻又求之不果的目標，卻因為「利他素」的使用而得到初步實現。由於人人無私勞動，知青農場成為一個吃飯不用飯票，公益金存款達數百元（在當時是一筆巨款）的烏托邦。⁴¹

取消工分的情節暗示了共產主義烏托邦的一大特色：「均平」。計算工分是中國農業實現合作化後始出現的制度，在 1950 年代至 1970 年代普遍實施於中國大陸農村。工分用以計量勞動和分配個人消費品，是當時一種普遍的經濟制度。⁴² 不評工分，按人頭分紅意味著取消農場各成員在生產報酬上的差異，體現了平均主義。平均主義乃毛澤東心目中真正共產主義的特色。⁴³

除了做到「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各取所需」、「均平」之外，知青農場還在另一個層面體現共產主義烏托邦的特色——勞動變成了第一生活需要而不是生活手段。⁴⁴ 勞動為第一生活需要在《蟻生》多處皆有描述。當賴安勝、陳得財和陳秀寬被噴灑蟻素後，三人主動要求到農場勞動，他們勞動得汗流如注，不單沒有抱怨，還在臉上漫溢喜色。⁴⁵ 農場中人人都有勞動的欲望，覺得勞動是光榮的事，「不再打上工鐘，不再分派農活，勞動全憑大伙兒主動」。⁴⁶ 本來想要殺死顏哲的賴安勝被噴灑「利他素」後，更衷心表示：「勞動最快樂，幫助他人最快樂。」⁴⁷ 他離開舒適的辦公室，把場長之位讓給顏哲，重投農業生產。小說如此描述吸入「利他素」的人：

⁴¹ 同前註，頁 235。

⁴² 黃英偉：〈工分制的制度經濟學分析〉，《二十一世紀》（2012 年 6 月號，總 131 期），頁 87。

⁴³ 林蘊暉：《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 4 卷：1958-1961。烏托邦運動：從大躍進到大饑荒》（香港：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8 年），頁 184。

⁴⁴ 馬克思指出，在共產主義社會的高級階級，精神勞動和肉體勞動的對立已然消滅，勞動不再是生活手段而是第一個生活需要。詳見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頁 22。

⁴⁵ 王晉康：《蟻生》，頁 111。

⁴⁶ 同前註，頁 143。

⁴⁷ 同前註，頁 108。

光輝是從內心深處發出的，他們的快樂在周圍形成了一個磁場，形成了強力的正反饋，讓所有人都沉浸在快樂中。⁴⁸

「利他素」徹底改變一個人的內在為人，消除人的「私心」，使人從內心深處萌生幫助他人的願望。自從顏哲向農場成員噴灑「利他素」後，整個農場都洋溢著勞動的快樂和幸福，人人都受利他主義支配，沒有內耗，運轉得像高效的螞蟻社會，沒有任何內耗和無用功；整個農場上都洋溢著快樂和幸福。⁴⁹ 成員的勞動熱情甚至感動了來農場做調查的紅星公社幹部大老魏，令他想起大躍進前期：人人只知道幹活，沒一點兒私心，幹得越累越高興；而這樣的景象已經多年沒見。⁵⁰ 當勞動不再是生活的擔子而成為一種發自內心的需要後，自然不會再有自私偷懶的舉動，這種自發地盡其所能工作的情況，必然能夠使生產力得到充分發展，為「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社會奠定堅實基礎。

透過「利他素」，毛澤東在「大躍進」、「文革」的未竟之功全都由顏哲來完成。「噴過蟻素後，農場變成了真正的伊甸園。」⁵¹ 在距離烏托邦目標越來越遠的「文革」歲月，顏哲為知青農場的成員帶來了一個共產主義烏托邦。

三、《蟻生》的反烏托邦書寫——批判烏托邦預設

王晉康《蟻生》沒有像浩然《金光大道》（1972）那樣汲於對共產主義烏托邦謳歌；反之，顏哲以「利他素」建立的共產主義烏托邦不足一年便告潰敗，充分展示了小說的反烏托邦立場。這種反烏托邦立場，通過批判各種烏托邦預設（Utopia presupposition），得到充分呈現。綜觀古今中外的烏托邦書寫，不論其描繪的烏托邦有何特色，皆建基於一系列反映了作者對理想世界和人性理解的烏托邦預設。易言之，烏托邦預設，便是烏托邦得以建立和存續的基本前

⁴⁸ 同前註，頁 111。

⁴⁹ 同前註，頁 147-148。

⁵⁰ 同前註，頁 175。

⁵¹ 同前註，頁 241。

題，像地基那樣承托著烏托邦大樓。若然這些預設存在不可克服的內在問題，整座烏托邦大樓亦會隨之土崩瓦解，故此反烏托邦書寫往往聚焦於質疑和批判這些烏托邦預設。《蟻生》亦不例外。後文將會圍繞《蟻生》批判的三項烏托邦預設進行析論。

（一）自視為「神」的烏托邦領袖及其不可超越的有限性

喬治·伍德科克（George Woodcock）指出：「烏托邦是按照計劃而永久設立和受到嚴格控制的社會，該計劃的設計者相信已照顧到全體人民的最大利益。」⁵²從此可見，烏托邦必定有一位身兼領袖的設計者。《烏托邦》提及「烏托邦」的全部設計出於烏托普國王之手，後代只是負責完成計劃和修飾加工。⁵³《太陽城》談及最高統治者「太陽」是一個博學賢明的人，能夠對一切問題和爭端進行最後裁決。⁵⁴從各種烏托邦書寫可見，領袖之於烏托邦非常重要。當代中國涉及烏托邦的小說，例如莫應豐《桃源夢》（1985）、李佩甫《羊的門》（1999）、閻連科《受活》（2003）、格非《山河入夢》（2007）、陳冠中《盛世》（2009）等，不管其對烏托邦的立場如何，無一不對烏托邦領袖的人格特質多所著墨。對於認同烏托邦追求的作品，分析領袖人物的形象，可以發現作家在某種文化價值、歷史條件下，對於理想政治領袖的看法。即或作家持反烏托邦立場，亦能通過領袖的人物形象分析，看出作家認定哪些人性局限是連烏托邦領袖都無法克服的，領袖又會在怎樣的歷史文化條件下錯估人性或形勢，誤以為一己之「正義」能夠代表全體。結果，烏托邦縱然建成一時，最後不是走向自身的反面（惡托邦），便是以可怖的毀滅告終。

烏托邦領袖自信掌握了開啟完美世界之門的鑰匙，所以能夠「照顧到全體

⁵²（加）George Woodcock, "Utopias in Negative," *Sewanee Review*, 64 (1956), p. 82.

⁵³（英）托瑪斯·摩爾（Thomas More）著，戴錙齡譯：《烏托邦》（臺北：志文出版社，2005年），頁96。

⁵⁴（義）托馬索·康帕內拉（Tommaso Campanella）著，陳大維、黎思復、黎廷弼合譯：《太陽城》（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年），頁6-14。

人民的最大利益」。衣俊卿指出，在追求烏托邦的過程裏，「人將自身提高到神的地位」，⁵⁵產生了一種超乎常人的自信。關於烏托邦主義者的信念，謝江平論及：

神是全知全能的，烏托邦主義者認為，人的認識能力也是無限的。人可以憑借經驗的或者理性的手段達到對世界的真理性認識，從而可以達到支配自然的目的。同樣，人也可以達到對歷史，對社會的真理性認識，並根據這種認識來建造人間的天堂，實現人最終的解放。⁵⁶

相信人可以達到神的境界，⁵⁷達到對世界的真理性認識，然後創建一個完美世界，向來是烏托邦書寫的重要特徵。在《蟻生》中，王晉康同樣把領袖顏哲刻劃成擁有「神性」的超凡人物。小說最初提及顏哲時，便形容他的一家「太超凡脫俗了，就像是天上的仙人來到凡間。」⁵⁸當顏哲向秋雲談及烏托邦計劃時，小說描述「他的眼睛閃閃發光，那是理想之光，是古今中外人類精英們最崇高的理想。」⁵⁹顏哲不僅氣質超凡，更具備烏托邦領袖必備的節制與勇氣。⁶⁰先論勇氣——雙親縱使在「文革」中受迫害而自殺致死，顏哲並沒有變得膽小，還是顯出勇氣與知青農場的場長賴安勝對抗，希望揭發他誘姦女知青的惡行。後來賴安勝設局謀害他，他則果斷地把父親留下的「利他素」投入使用，先把賴安勝改造成「新人」，再向秋雲以外的全體成員噴灑「利他素」，銳意在知

⁵⁵ 衣俊卿：《歷史與烏托邦：歷史哲學：走出傳統歷史設計之誤區》（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頁35。

⁵⁶ 謝江平：《反烏托邦思想的哲學研究》，頁52。

⁵⁷ 謝江平指出，在西方哲學思想中，人可以取代神的這種觀念並不是源自基督教傳統，反而源自否定原罪的基督教異教原則，例如貝拉吉烏斯教義（Pelagianism）。詳見同前註，頁51。

⁵⁸ 王晉康：《蟻生》，頁27。

⁵⁹ 同前註，頁118。

⁶⁰ 陳周旺指出烏托邦領袖必須具備政治美德，將政治統治視為責任和使命而不是追逐名利的手段。在各種政治美德中，陳周旺根據柏拉圖《理想國》，提出「最為根本乃在於節制與勇氣。見陳周旺：《正義之善——論烏托邦的政治意義》（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頁75-78。

青農場創建烏托邦。⁶¹再論節制——當顏哲見識到農場成員吸入「利他素」而表現的幸福和快樂時，他也很想把「利他素」用在自己身上，⁶²但意識到現階段烏托邦的成員仍然需要顏哲定期為他們注入「利他素」，⁶³故此他為了全體成員的利益，決定表現節制，暫時不去親身體驗吸入「利他素」的快樂。⁶⁴事實上，當顏哲成為知青農場的領袖後，他本可以為所欲為，卻一直保持著清醒和強烈的自省意識，視手上的權力為責任和使命，而不是追名逐利的手段。顏哲勞心勞力地為這個新生的烏托邦繪製藍圖，力圖預先發現各種未知的陷阱，⁶⁵希望最終建立一個不靠外部力量／監管者便能自行運轉的烏托邦。⁶⁶身為顏哲情人的秋雲，亦深受感動，以副手身份陪伴他承受扮演「清醒的監管者」的痛苦，致力保護知青農場的成員不受外界所害。⁶⁷

除了勇氣和節制外，烏托邦領袖還得展現非同尋常的智慧，才能設計一個完美的烏托邦。顏哲雖然只有 20 歲，⁶⁸但小說不時形容他眼光敏銳、⁶⁹「站在哲理的高度思考問題」，⁷⁰「思考是顏哲這樣的人特有的專利」。⁷¹凡此種種皆可見出王晉康著力把顏哲塑造成具有「神性」的烏托邦領袖。顏哲的確智謀超卓——他化解了賴安勝的殺人計劃後，更平定了莊學胥和崔振山在庫房會議中嘗試扳倒自己的陰謀。他想出以噴灑特效疫苗防範「虎拉熱」（顏哲虛構的傳染病名稱）的藉口，利用庫房密閉的空間條件，以農用噴霧器向全體成員

⁶¹ 王晉康：《蟻生》，頁 124。

⁶² 同前註，頁 145。

⁶³ 同前註，頁 157。

⁶⁴ 同前註，頁 119。

⁶⁵ 同前註，頁 161-162。

⁶⁶ 同前註，頁 157。

⁶⁷ 同前註，頁 145。

⁶⁸ 同前註，頁 248。

⁶⁹ 同前註，頁 151。

⁷⁰ 同前註，頁 156。

⁷¹ 同前註，頁 153。

噴灑「利他素」，成功把知青農場的成員改造成「新人」。⁷² 及後，紅星公社知青辦主任老魏叔和婦聯主任谷翠花察覺到農場有異樣，親自趕來調查時，只是發現農場在顏哲領導下，「就像大躍進前期那樣乾淨，人們只知道幹活，沒一點與私心，幹得越累越高興」。⁷³ 不過，為免老魏叔向上級報告農場的現況，顏哲向二人噴灑「利他素」，索性把他們留在知青農場。⁷⁴

自從顏哲成功利用「利他素」築造烏托邦後，他對自身有了不一樣的認識：

那天我（按：秋雲）到場長室，見這兒已經大變樣，牆上掛滿了木工鋸、鉋子、鑿子和斧頭，一條木工長凳順在門外邊，旁邊拋散著鋸末和刨花。這些木工家什原來放在牛屋隔牆的一間空屋裏，顏哲說挪到這兒方便，看書累了就幹一會兒，等於是課間休息。

我逗他：「這是場長室還是木匠坊？以後大家喊你顏場長還是顏木匠呢？」

「隨便。」

「以後就喊你小木匠吧，不過可沒看輕你的意思。國家領導人中就至少有兩個是木匠出身。」

顏哲平淡地說：「還有一個人也是木匠耶穌。」

我當時沒有在意，說了幾句閒話就走了。但後來想到他這句話，越想越覺得其中有深義。他可能並非有意拿耶穌來自比，但兩人確實神似：宗教的激情，憂鬱的氣質，蒼白的膚色，瘦削的身體，還有，目光中高燒病人般的熾熱。可以說，他和耶穌一樣，也是信徒簇擁的一個白皮膚的神，只是他懾服眾生時依靠的是科學而不是虛無的神跡。⁷⁵

顏哲當上領袖後，成員除了對他言聽計從，更不許他參加農場的勞動，顏哲只需要負責農場裏無人懂得做的零星木工活，以及仔細籌劃農場的未來。秋雲把

⁷² 同前註，頁 137-140。

⁷³ 同前註，頁 175。

⁷⁴ 同前註，頁 177。

⁷⁵ 同前註，頁 162。

顏哲稱為木匠並無貶意，畢竟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兩位國家領導人（李先念和李瑞環）都曾經當過木匠。⁷⁶不過，顏哲顯然不止是把自己比作國家領導人——他糾正秋雲，當過木匠的還包括基督教的創立人——上帝的兒子耶穌。在基督教信仰中，耶穌是上帝差派來拯救世人的救主，是上帝王國的君王，能夠為人類帶來光明的前途和希望。顏哲自比耶穌，顯然不是無意識的類比，而是對自身的定位——他是被選定來到這個「文革」亂世拯救眾生的「神」，他借助科學的力量（「利他素」）成功把昔日黑暗的知青農場改造為今日光明的共產主義烏托邦——人人熱愛勞動，「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分配達至「均平」的同時，又以公益金協助成員「各取所需」。

王晉康自言，他的小說主角多是那種道德高尚、智力超群的科學虔誠信徒。⁷⁷綜上所述，顏哲的確符合前述特點。然而，《蟻生》異於王晉康其他小說的是，顏哲在「神」的位置上待了不足半年，⁷⁸內心便漸漸起了不良的變化。當秋雲的大姐為了城裏招工一事來到農場，顏哲為了令大姐感受到家庭的溫馨，指示農場成員中午吃羊肉餃子（當時只有春節和國慶才能吃餃子）。⁷⁹顏哲此舉並非為了展示共產主義烏托邦的優越性，而是為了取悅情人（秋雲）的大姐，就連秋雲都猜想「顏哲這個命令多少有些私心吧」。⁸⁰除了無法徹底排除私心，他更不能接受自己被監督。當他發現老魏叔身上的「利他素」已經失效，卻裝作若無其事地在群眾中觀察自己後，頓時心生不滿。他不滿一直以「神」的目光來觀察農場成員的自己，竟然也是被觀察的對象。⁸¹不僅如此，

⁷⁶ 李先念（曾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席）和李瑞環（曾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皆是木匠出身。

⁷⁷ 陳楸帆：〈悲憫的人性觀察者——著名科幻作家王晉康專訪〉，《世界科幻博覽》第8期（2017年），頁12。

⁷⁸ 秋雲說自己當「上帝副手」不足半年，可見，顏哲當上「蟻王」也不足半年。見王晉康：《蟻生》，頁261。

⁷⁹ 同前註，頁231。

⁸⁰ 同前註。

⁸¹ 同前註，頁258。

顏哲更認為自己操有生殺予奪之權。當賴安勝仗義為孫小小趕走腿上的水螞蟥時，顏哲誤會他惡性難除，意圖強暴僅得十五歲的孫小小。尚未弄清原委前，顏哲便下令掐死賴安勝。最後真相大白，賴安勝保住性命，顏哲亦向群眾道歉，並得到眾人原諒。然而，顏哲的行徑招來秋雲不安，秋雲不禁心生「莫非他真把自己看成了生殺予奪的上帝？」的疑問。⁸²

「權力使人腐化，絕對的權力使人絕對的腐化。」當「利他素」改造了農場成員的本性時，也賦予顏哲絕對的權力和不容挑戰的地位——他不再是當初擔心烏托邦會出現擁有絕對權力的邪惡領袖的顏哲了——因為他本人已經在不知不覺中踏上成為邪惡領袖的道路。一直陪伴顏哲的秋雲清楚看出，「一個有大智慧的人，如果走火入魔，會乖張悖誤到啥程度」。⁸³

此外，「利他素」雖然能夠去除人的私欲，激發人的利他主義精神，但它應用在人類身上將會產生什麼效果和副作用，就連它的發明者——顏夫之也無法完全預料，所以他才寄望顏哲延續研究，並且要求顏哲「一生中不准投入實用」。⁸⁴不過，顏哲認為父親過分謹慎，應該在小範圍中試用，才能把研究成果實踐出來。日後發生的事件證明，顏夫之的謹慎不無道理。「利他素」噴灑在人類身上後，效力只能夠維持一段時間，需要重複噴灑。為此，顏哲製作了新一批「利他素」作補充。包括老魏叔在內的六人在荒崗上被顏哲噴灑了最新煉製而成的「利他素」後，不幸地招致農場其他成員襲擊。原來，螞蟥的利他主義只針對自己的族群，對其他族群則非常殘忍。新一批「利他素」令農場成員視老魏叔等人為異類，加以襲擊。結果，這場顏哲意料之外的鬥爭造成了農場七名成員喪生。

無論顏哲多麼有智慧，甚至手執「利他素」，他終究不能超越人的有限性。《蟻生》意圖揭示那些自視為「神」的烏托邦領袖，不單個性會隨身處

⁸² 同前註，頁 243-246。

⁸³ 同前註，頁 278。

⁸⁴ 同前註，頁 116。

的權力位置改變，亦有不能克服的私心和判斷錯誤的時候。烏托邦領袖自視為「神」，只是狂妄自大的表現，終究會為治下人民帶來災難。正如保羅·蒂里希（Paul Tillich）所言，烏托邦的不真實性在於它忘記了人的有限性。⁸⁵ 王晉康正正是從烏托邦領袖（人）的有限性來揭示烏托邦的不可能性。

王晉康一方面揭示烏托邦領袖受制於人的有限性，另一方面則批判人如果想要憑科學的力量來改造人性，是極為危險的做法。張頤武指出，「科學在中國現代被賦予了和迷信及落後決裂的重要的倫理意義。」⁸⁶ 從晚清開始，科學力量慣常被烏托邦小說賦予崇高的地位，扮演不可或缺的建設性力量。例如吳趸人《新石頭記》（1905）描述的「文明境界」必須依託各種高度發達的科技才能建成；旅生《癡人說夢記》（1904）也描述賈希仙憑手槍（科技產物）折服了仙人島的統治者，好讓他在島上建立烏托邦——鎮仙城。不過，王晉康始終對於人類能夠完全駕馭科學力量的想法心存戒懼，特別當科學力量被用來改造人性時，他的小說幾乎都持否定立場。在《豹人》（2003）中，科學家謝教授替主角謝豹飛嵌入了少量獵豹基因，令他得以打破短跑世界紀錄。然而，基因被改造過的謝豹飛亦獸性大發，強暴了中國姑娘田歌，將她咬死，釀成悲劇。《癌人》（2003）中的 PPG 藥業公司總裁約翰·羅伯遜為了拯救患上肝壞死的妻子，設法使生物學家保羅以海拉細胞（懂得無限分裂增生，長生不死的癌細胞）複製一個黑人女孩，以圖取得其肝臟拯救妻子。這項科研成果最終令女孩被視為「非人」，變成一具為人類供應備用器官的「身體」。當人類運用科學力量改造人類時（不論是改變人性、基因，還是複製人類）王晉康總是在小說中為這些行動給出災難性結局。可見，他並不相信人類有足夠的智慧徹底駕馭科學力量，特別當科學觸碰到人性的改造時。

⁸⁵ （美）Paul Tillich, *Political Expectation*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1), p. 171.

⁸⁶ 張頤武：〈主流化進程與想象的重構：科幻文學與當下中國〉，《山花》第19期（2015年），頁123。

（二）對於烏托邦「一元論」的質疑

以賽亞·伯林（Isaiah Berlin）論及，不管是柏拉圖的理想國，還是培根的新大西島，這些作者都堅信世界上存在著真實不變、普遍地適用於任何人和地方的價值。不同的烏托邦思想源自不同的價值理念，但它們都確信自己才是解決一切社會問題的正確答案。⁸⁷ 因為真理（正確答案）只可能有一種（one only），真理以外的皆是謬誤。⁸⁸ 職是之故，烏托邦思想存在著鮮明的「一元論」（Monism）預設。「一元論」預設內含等級制的思維模式——目的與手段、本質與現象、真理與謬誤之間，前者的級別高於後者。兩者產生衝突的話，較為低級的一項就要作出犧牲或接受強制。⁸⁹ 既然烏托邦主義者確信自己的計劃是惟一正確的方案，那麼問題就在於如何把現存的社會轉變為烏托邦。《蟻生》把小說時空設定為「文革」，不啻就是要追問：當毛澤東主張通過階級鬥爭和對傳統文化的批判達致「人的思想的『無產階級化』」，⁹⁰ 在歷史現實中非但無法取得成功，反而造成極大的社會混亂；那末，應該透過怎樣的手段才能實現「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共產主義烏托邦？科學技術會否比思想改造或政治批判運動更有效？

為了回答這個問題，顏哲在知青農場進行了一次科學實驗；他向自己和秋雲以外的全體成員噴灑「利他素」。「利他素」的確改變了農場成員的性情，即使是惡行纍纍的賴安勝都變成了善良勤勞的人。為了令這個烏托邦能夠不靠外力而自行運轉，延續下去，顏哲研究怎樣可以把成員身上的利他習性穩固下來，最終變成族群本能。顏哲想到以岑明霞和賴安勝尚未出生的私生女兒為實驗品，定期向岑明霞噴灑「利他素」，以觀察她是否能夠繁衍出擁有純潔利他

⁸⁷ （英）Isaiah Berlin, *The Crooked Timber of Humanity: Chapter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20-27, 211-212.

⁸⁸ 同前註，頁 209。

⁸⁹ 謝江平：《反烏托邦思想的哲學研究》，頁 42。

⁹⁰ （美）莫里斯·邁斯納著，杜蒲譯：《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05 年），頁 276。

天性的後代。由於岑明霞懷孕前並未噴灑「利他素」，顏哲打算日後讓她再度懷孕，以進行對比實驗。對於以未出生的孩子為實驗品一事，向來對顏哲言聽計從的秋雲產生了基於本能的反感。⁹¹ 後來，顏哲留意到螞蟻社會是沒有持續的全員性欲的（蟻后一生只需要交配一次便可以持續生育），他擔心提煉自螞蟻的「利他素」會不會也有降低人群性欲的副作用，決定安排素有私情的老魏叔和谷翠花同居，以此進行性欲實驗。這次秋雲忍無可忍，覺得顏哲視人類為實驗用的小白鼠，無視人類的素樸情感，實在過於陰暗。她甚至開始懷疑顏哲是否真的自視為神，有權隨意支配農場成員的生活。顏哲認為秋雲和他看問題的基點有著根本性分歧，早晚都會分道揚鑣；⁹² 二人的分歧最終在毆鬥事件中演化為決裂。

當包括老魏叔在內的七人死於毆鬥事件。⁹³ 秋雲決定趕走顏哲，結束整場烏托邦實驗。顏哲雖然對成員的死感到內疚，卻認為他有責任試驗這個烏托邦的方方面面，例如如何面對戰爭的問題等；他認為應該視這場不幸的事故為一次不可豁免的試驗。顏哲指出：「上帝的道德準則和人類不同，他向來只關心種族的延續，並不關心個體的命運……。」⁹⁴

事實上，從顏哲以人類為實驗品，再到他面對毆鬥事件的反應，在在反映了「一元論」的烏托邦預設——為了實現集體幸福的烏托邦，個體的生命並不重要。烏托邦的存續比烏托邦中的任何生命更重要——除了手執「利他素」及其製造方法的顏哲，沒有誰在這個烏托邦是不可或缺的。自覺手握真理的烏托邦領袖有權決定一切道德準則，他就是神，而農場的所有成員不過是「螞蟻」。

秋雲和顏哲之所以產生矛盾，主要源自她站在人道主義立場，無法接受「一元論」的烏托邦預設。她關心農場成員的個體生命和情感多於顏哲的烏托邦理想——小說名為《蟻生》，可見即使微小如螞蟻，亦有其生命與生活，更

⁹¹ 王晉康：《蟻生》，頁 159。

⁹² 同前註，頁 183-184。

⁹³ 同前註，頁 267-269。

⁹⁴ 同前註，頁 277-278。

何況是人類？雖然趙海虹認為王晉康的小說普遍展現出一種強調種群的「大生存權」，個人的「小生存權」則可以被犧牲的觀點，⁹⁵但《蟻生》卻非如此。誠如劉志榮所言，王晉康在《蟻生》中始終「持守著某種人性的尊嚴」。⁹⁶人類的生命和尊嚴，其價值絕不低於烏托邦理想。

（三）對操控人類自然狀態的憂慮

顏哲之所以能夠建立一個共產主義烏托邦，關鍵在於「利他素」能夠改變人類自私的基因。通過基因改造，顏哲掌握了操控人性的鑰匙。事實上，王晉康的科幻小說相當關心基因改造帶來的倫理和社會問題。前文提及的《豹人》便旨在揭示改造人類基因雖然可以提高人類在體育競技上的表現，亦勢必造成不可逆料的災難性後果；又例如《替天行道》（2001）談及一種基因改造的「魔王麥」，雖然地域適應性廣，集各種小麥優點於一身，但它在收成後只能用作食物而不能做種子。不單如此，它更會污染曾經播種過「魔王麥」的土地，把「自殺基因」傳播給其他小麥。由此可見，王晉康的小說在基因改造的議題上持反對態度，他非常擔憂基因改造引致的潛在風險。邁可·桑德爾（Michael J. Sandel）指出，人類在遺傳學上的突破，特別是基因改造技術上的突破，同時為人類帶來希望與困境——希望是人類能治療和預防大量衰退性疾病；困境則是人類也許能夠操控人類的自然狀態。⁹⁷

對操控人類自然狀態的憂慮在《蟻生》得到淋漓盡致的發揮。「利他素」的最大功能在於讓人生出如螞蟻那樣的強大利他意識，拋棄私欲，熱愛勞動。自從噴灑「利他素」後，人們像螞蟻一樣主動填滿所有需要勞動的崗位，⁹⁸

⁹⁵ 趙海虹：〈王晉康——中國科幻的思想者〉，王衛英編：《中國科幻的思想者——王晉康科幻創作研究文集》，頁 71。

⁹⁶ 劉志榮：〈當代中國新科幻中的人文議題〉，《南方文壇》第 1 期（2012 年），頁 56。

⁹⁷ （美）邁可·桑德爾（Michael J. Sandel）著，黃慧慧譯：《反對完美：科技與人性的正義之戰》（臺北：博雅書屋，2013 年），頁 43-44。

⁹⁸ 王晉康：《蟻生》，頁 144。

無條件執行顏哲（蟻王）及其副手秋雲的命令。⁹⁹ 成員被噴灑了「利他素」後，臉上都流露出一種平靜和幸福的快樂表情。不過，秋雲卻感到「這種幸福都帶著夢遊的色彩，坦率地說，現在大伙兒的言行是由咱們控制著的」。¹⁰⁰ 的確，成員在感到無私勞動的快樂的同時，也失去了自由意志，完全聽憑「利他素」的影響和顏哲的指示來行動。秋雲的感受毋寧是要提醒讀者，通過「利他素」實現的共產主義烏托邦，並非看上去那樣美好。烏托邦實驗失敗後 36 年，秋雲的丈夫高自遠便批評這個烏托邦是由「一個獨自清醒的上帝，放牧著一群夢遊狀態下的幸福蟻眾」。¹⁰¹ 若然深入剖析這個共產主義烏托邦的本質，不難發現它與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在《極權主義的根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提出的，藉意識形態從事全面控制的極權主義統治有異曲同工之處。蔡英文在總結鄂蘭筆下的極權主義時，指出極權主義採納的意識形態自稱能夠對人類整體發展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做出全盤解釋，認定人類整體的歷史意義在於實現某一終極目的。為了實現這個終極目的，極權統治致力把人之多元性壓縮成單調的集體同一性，組織他們為終極目的奉獻犧牲。至於極權統治的領袖，一邊企圖改變人性，一邊謙稱是執行歷史之動態法則的工具。¹⁰² 雖然顏哲運用科學手段（「利他素」）而非意識形態來操控農場成員的行為，但他對螞蟻社會呈現出來的「利他主義」精神，高效率 and 高度組織性信服不已。發明「利他素」的顏夫之曾經在自己的著作《論利他主義的螞蟻社會》中指出螞蟻是地球上所有生物中最成功的種群，而螞蟻社會比人類社會遠為先進和高尚，因為那是完全利他主義的社會，全部個體都是無私、犧牲、紀律和勤勞的典範。螞蟻的利他主義源自基因，牠們的利他主義是內稟穩定的，8000 萬年來都沒有斷裂。研究螞蟻社會後，顏夫之的結論是：「如果我們能以螞蟻社會

⁹⁹ 同前註，頁 160。

¹⁰⁰ 同前註，頁 145。

¹⁰¹ 同前註，頁 326。

¹⁰² 蔡英文：《政治實踐與公共空間——漢娜·鄂蘭的政治思想》（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2 年），頁 1-5。

為楷模，人類文明該發展到何等的高度！」¹⁰³ 顏哲繼承了父親的看法，視螞蟻社會為人類社會發展的終極目的：

「因為蟻群的利他主義來自於天性，所以它是內稟穩定的，從螞蟻社會建立到現在數千萬年都沒有斷裂。非常可惜啊，在人類天性中沒有這種利他主義，或者更準確地說，是利他天性不佔優勢。所以從古到今，人類社會盡在善惡之間搖擺。聖人的『向善』教化抵不住人類的『趨惡』本性。你肯定不會忘記 1958 年大躍進，那時的社會多乾淨！人人忘我勞動，不計私利，盡情享受勞動的愉悅。再看看文化大革命至今的醜惡，和那時不啻是天壤之別。比比螞蟻，人類真該臉紅！」¹⁰⁴

仔細分析顏哲的說話，讀者不難發現顏哲有一種發現了人類社會理想形態的自信。對所持理念高度自信向來是烏托邦領袖的特徵；饒有意味的是，顏哲心目中的理想社會形態是 1958 年的「大躍進」。眾所周知，「大躍進」是毛澤東為了躍進共產主義烏托邦，依託人民公社為手段發起的烏托邦運動。「大躍進」以及後來的「文革」無法為中國社會實現共產主義烏托邦，但失敗的原因不在於追求共產主義烏托邦理念本身，而在於兩點：（1）在人類天性（基因）中的「利他主義」不佔優勢，人性本「惡」；（2）以「教化」的手段來改變人性效果不彰。這是顏哲歸納出來的「真理」，而「利他素」則是解決這個問題的特效良方。至於顏哲念茲在茲的「利他主義」，誠如前文所論，實乃毛澤東思想的重要內涵。

顏哲從沒有否定「文革」的終極目標——建立一個「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共產主義烏托邦。在這個意義上，「他懷有和毛同樣的烏托邦衝動」。¹⁰⁵ 顏哲想要否定的只是「文革」的手段：通過「教化」（不論是自我的政治覺悟還是參加毛澤東思想學習班）來培養利他主義精神，必然是徒勞無功的。顏哲

¹⁰³ 王晉康：《蟻生》，頁 6。

¹⁰⁴ 同前註，頁 114。

¹⁰⁵ 宋明煒著，王振譯：〈1989 年以後：中國科幻新浪潮的烏托邦變奏〉，頁 67。

認為實現烏托邦的方法只有一種，就是通過「科學」的手段——借助「利他素」來改造，以及操控人類的自然本性。

顏哲企圖以「利他素」來實現「大躍進」和「文革」的未竟之業，從其效果來說，與鄂蘭提出的極權統治特點之一：意識形態「全面統治」（total domination）遙相呼應：

極權統治努力把無限多元和無限區別的人組織起來，似乎將全人類只看作是一個人，只有每一個個人的各種反應可以降低到一種絕對不變的一致，使每一組反應能夠與另一組反應隨意互換，才能使極權統治成為可能。¹⁰⁶

當「利他素」成功令全體成員自發勞動，一致認為勞動是最光榮和快樂的事，他們每一個人的反應便「降低到一種絕對不變的一致」（雖然顏哲認為這是一種「提高」），人人都受深層次的利他主義驅動來做事，但這種驅動力並非出於人性，僅是受「利他素」「全面統治」的結果。人類之所以為人類，其個體性與獨特性乃是由自然、意志和命運共同塑造出來的，¹⁰⁷人要具有「人類」的「本性」（nature），必須在高度超越自然（highly unnatural）時才有可能。¹⁰⁸在人類的自然狀態下，人天生擁有自由意志。然而，「利他素」和「全面統治」皆旨在抹煞人類的個體性和獨特性。「全面控制」意欲製造一種與某些動物種族相似的物種：「人獸」（specimens of the human animal），¹⁰⁹其唯一的「自由」就是「維持種族生存」。¹¹⁰這點和顏哲的想法展現出驚人的一致：「上帝的道德準則和人類不同，他向來只關心種族的延續，並不關心個體的命運……。」¹¹¹顏哲自視為「上帝」，而他想要建造的共產主義烏托邦，無論

¹⁰⁶ (美) Hannah 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2004), p. 565.

¹⁰⁷ 同前註，頁 585-586.

¹⁰⁸ 同前註，頁 586。

¹⁰⁹ 同前註，頁 586。

¹¹⁰ 王晉康：《蟻生》，頁 565。

¹¹¹ 同前註，頁 277-278。

生產力有多高，人人無私利他，最終也不過是一個取消了自由意志，把人變成「人獸」／螞蟥的地方。

王晉康絕非想要歌頌這個操控了人類自然狀態的烏托邦，反而想要指出個人自由意志／道德判斷淪喪後，將會為人類社會帶來嚴重的災難。小說尾聲，兩批噴上不同批次的「利他素」農場成員，像兩群種族不同的螞蟥般互相攻擊，最終釀成七人死亡的悲劇。這場悲劇發生時，成員渾然忘卻彼此曾經朝夕共處（崔振山和王全忠對掐），甚或是相愛的戀人（谷翠花和老魏叔對掐），他們受「利他素」操控而互相撕殺，良心一聲不響——人類的自由意志和道德判斷完全被「全面統治」了人性的「利他素」所取消。

四、雙重反思：烏托邦與「文革」

《蟻生》以共產主義烏托邦的崩潰告終，昭示了全書的反烏托邦立場。烏托邦領袖自視為「神」，卻無法擺脫其屬於「人」的有限性。「一元論」的烏托邦預設把實現集體幸福視為最高價值，個體生命的尊嚴和感受完全被無視。

「全面統治」通過「利他素」把無限多元的人所能有的各樣反應降低為絕對一致；「人生」最終成為「蟻生」。王晉康通過揭露烏托邦預設的種種不可能性，達成對烏托邦和「文革」的雙重批判。

《蟻生》的前半部分有不少地方直接描寫「文革」為顏哲一家帶來的不幸，以及「文革」期間人性之「惡」的情節，例如顏家在「破四舊」期間被抄家，¹¹²顏夫之及其妻子不堪折辱而相繼自殺。¹¹³就連從未打過人的秋雲，受「文革」的熾熱氣氛感染，也加入了武鬥的行列，打傷顏夫之。¹¹⁴《蟻生》對「文革」的混亂和暴力的書寫，並未與新時期的「傷痕文學」或「反思文學」有太大分

¹¹² 同前註，頁 65。

¹¹³ 同前註，頁 85-88。

¹¹⁴ 同前註，頁 81-82。

野。《蟻生》值得留意的地方在於，小說如何把對「文革」的反思縮合在其反烏托邦書寫之中。

卡爾·曼海姆（Karl Mannheim）在《意識形態與烏托邦》（*Ideology and Utopia*）裏指出，烏托邦旨在改變：「我們把所有超越環境的無論如何都具有改變現存歷史—社會秩序的作用思想（不僅僅是願望的投入）都看作是烏托邦。」¹¹⁵ 烏托邦往往從對現存世界的不滿中誕生，例如在第二節便提及摩爾寫作《烏托邦》，主要源於對當日英國社會現實的不滿。由是觀之，《蟻生》在前半部分書寫「文革」引致的暴力和混亂，旨在為顏哲創建烏托邦帶來合理性。弔詭的是，顏哲憑「利他素」創建共產主義烏托邦的過程，卻處處透現出毛澤東發動的烏托邦運動的特色。

「文革」時期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達到頂點，毛澤東被稱為「最紅最紅的紅太陽」，而他亦自信擁有「真理」，理應得到群眾崇拜。¹¹⁶ 邁斯納指出，群眾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混合了現代革命的宗教象徵主義和中國傳統的宗教象徵主義，¹¹⁷ 擁有宗教的維度。錢理群則指出文革中的毛澤東崇拜從一開始就有宗教儀式化的特徵。¹¹⁸ 丹尼爾·里斯（Daniel Leese）更提出言辭和儀式崇拜對於建立「文革」時期的毛澤東崇拜所起的重要作用。¹¹⁹ 不管如何，毛澤東在「文革」時期被群眾視為無所不能的「神」，乃一學界公認的歷史現象。誠如前文所述，顏哲身為烏托邦領袖，在創建烏托邦的過程裏，亦逐漸在心態上自視為「神」，認為自己能夠開創烏托邦。然而，顏哲就和毛澤東一樣，即

¹¹⁵（德）卡爾·曼海姆（Karl Mannheim）著，姚仁權譯：《意識形態與烏托邦》（北京：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頁195。

¹¹⁶ 莫里斯·邁斯納：《毛澤東與馬克思、烏托邦主義》，頁170。

¹¹⁷ 同前註，頁174。

¹¹⁸ 錢理群：《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1949-2009）：另一種歷史書寫（下）》（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3年），頁29。

¹¹⁹（德）Daniel Leese, *Mao Cult Rhetoric and Ritual in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16.

或自視為「神」，其智慧終究有限，亦無法預見未來。「文革」沒有帶來由「新人」組成的共產主義烏托邦，只換來巨大的社會動盪和破壞；顏哲以「利他素」建立的共產主義烏托邦亦釀成七人喪命的悲劇，最終被突如其來的洪水吞滅。毛澤東和顏哲發動的烏托邦運動之所以失敗，乃是因為他們漠視了人的有限性——任何自視為「神」的領袖，終必為其治下的人民帶來痛苦與災難——毛澤東如是，顏哲也如是——這是王晉康通過《蟻生》意圖確立的反烏托邦書寫主題。

這樣的反烏托邦書寫就像 1980 年代以後的中國先鋒小說，帶有反崇高（desublimation）立場。¹²⁰ 王斑指出，中國當代美學存在一種強烈的英雄崇拜，¹²¹ 這在「文革」中達到頂點，歷史成為了朝著烏托邦一路發展的神話史詩，個人在其中扮演聖徒與超人。¹²² 顏哲自視為開創烏托邦的「神」，正好體現了對歷史的崇高主體性的追求——他渴望成就毛澤東所不能完成的烏托邦事業。然而，這場烏托邦實驗最後終結於秋雲之手。當農場鬧出人命後，秋雲把顏哲的衣服放進死者旁的墓坑，對農場成員訛稱顏哲已死。成員向來視秋雲為副領袖，毫不懷疑地言聽計從。情節乍看之下十分荒誕，成員怎麼可能單憑墓坑中的衣服便相信顏哲已死？筆者認為，如此情節安排有兩層含意。第一，成員受「利他素」的「全面統治」，已經失卻自由意志和獨立思考的能力，對顏哲或秋雲唯命是從；在顏哲不在場的時候，秋雲便是不容質疑的領袖。第二，顏哲的「死」沒有令成員感到悲傷，因為成員知道自己仍有秋雲領導便感到安心。¹²³ 這顯然是對自視為「神」的烏托邦領袖的極大嘲諷——當烏托邦領袖以為自己不可或缺，功績將會被民眾永遠銘記之際，民眾竟然對他逝去毫無反應。「神」沒有被紀念，領袖被民眾遺忘——這不啻是一種反崇高的表現。

¹²⁰ (美) Ban Wang, *The Sublime Figure of History: Aesthetics and Politic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231.

¹²¹ 同前註。

¹²² 同前註，頁 230。

¹²³ 王晉康：《蟻生》，頁 275-276。

任何烏托邦思想都存在鮮明的「一元論」預設，因為烏托邦領袖不僅是要建造一個更好的社會，而是一個最好的社會。歷史的列車停在烏托邦的終點站，烏托邦成為人類社會的最終形態，持續運行至永遠，一如螞蟻社會那樣，8000 萬年來既無斷裂，亦無改變。毛澤東畢生追求的共產主義烏托邦便是由馬克思主義這種「真理」所擔保的人類社會最終形態。為了把現存的社會秩序轉變為共產主義烏托邦，任何的犧牲都值得付出。「三年苦幹換來共產主義千年樂園」（「大躍進」時期的口號）、「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不獲全勝，決不收兵！」（「文革」時期的口號）。完美的烏托邦是惟一至善的，為了實現它需要不問代價的「激情和犧牲」；¹²⁴ 這意味個體的生命和情感皆可棄。

可是，代價真的不重要嗎？誰有權決定哪些代價重要，哪些不重要？無數生命在「大躍進」和「文革」中灰飛煙滅。夫妻反目，師生互鬥，兄弟鬩牆的事情屢見不鮮，人類素樸的情感在烏托邦運動中被無情地扭曲、碾碎。在《蟻生》中，農場成員在噴灑「利他素」後，一方面對顏哲表現無條件服從，另一方面亦失去了自由意志和人類應有的情感（這不由得令人想起受毛澤東思想支配的紅衛兵）。毆鬥事件造成七人死亡，但顏哲只視為一個無心促成的試驗，讓他得以了解烏托邦應該如何面對戰爭。顏哲視烏托邦的存續比人類生命更為重要的觀點，令秋雲感到懼怕。¹²⁵ 那些負責掩埋屍體的人受「利他素」影響，倒是沒有顯出太深的悲傷。¹²⁶ 可見，為了烏托邦的存續，人類的生命和情感都可以被犧牲。王晉康意欲邀請讀者留意的正正是毛澤東和顏哲發動的烏托邦運動中，「一元論」的烏托邦預設帶來的危害。

此外，顏哲以「利他素」操控人類基因，實施「全面統治」，其做法豈不是與「文革」如出一轍嗎？事實上，陶東風便曾經指出，阿倫特的極權主義觀

¹²⁴ 謝江平：《反烏托邦思想的哲學研究》，頁 210。

¹²⁵ 王晉康：《蟻生》，頁 277-278。

¹²⁶ 同前註，頁 274。

點能夠用於解釋發生在「文革」的一些社會現象。¹²⁷ 那麼，極權主義如何能夠徹底操控人民的行為？鄂蘭認為其中一個方法就是透過菁英組織的意識形態灌輸來達到這個目的。¹²⁸ 毛澤東領導的中共從來不曾停止通過政治教育來實現意識形態灌輸。在「文革」前夕到「文革」期間，解放軍中的「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運動」、「學習雷鋒運動」以及持續不斷的學習毛澤東著作的政治學習運動（例如毛澤東思想學習班），不單強化了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更達成意識形態灌輸的效果。里斯論及文革前夕，中共強行把大眾傳媒按中共宣傳部門的標準來調整，使其走上強調毛澤東重要性的報道路線。¹²⁹ 情形確實如錢理群所言，「文革」意識形態中的革命意志與群眾意志，皆是毛澤東意志的外化，最終要服從毛澤東的意志。¹³⁰ 易言之，毛澤東希望對群眾達成「全面統治」，讓他們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讓中國人民統一在他的思想下，一致地為過渡到共產主義獻身。不過，「全面統治」最終只會弱化個體的能動性。尤有甚者，「全面統治」下的人民所組成的巨大力量，隨時會把社會推向災難的深淵。

五、對烏托邦幽影不散的警剔

在《蟻生》的第三章，時間來到 2006 年，秋雲 55 歲，正式踏入她的退休生活。在一次與崔振山的聚會裏，她聽說當年的知青農場出現了「螞蟻朝聖」（螞蟻受「利他素」吸引而大量聚集）的現象，¹³¹ 於是和丈夫高自遠重遊舊地，

¹²⁷ 例如「文革」期間把消除「牛鬼蛇神」、「階級敵人」視為歷史的必然發展，與納粹德國把消滅猶太人為遵循「自然法則」的正義行為並無二致。陶東風：〈阿倫特與當代中國問題〉，《學術界》第 207 期（2015 年），頁 9。

¹²⁸ Hannah 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p. 565.

¹²⁹ （德）丹尼爾·里斯（Daniel Leese）著，秦和聲等譯：《崇拜毛：文化大革命中心言辭崇拜與儀式崇拜》（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17 年），頁 114。

¹³⁰ 錢理群：《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1949-2009）：另一種歷史書寫（下）》，頁 32。

¹³¹ 王晉康：《蟻生》，頁 313。

並在顏哲的衣冠塚找到一枝裝有「利他素」的噴霧器。秋雲振動不已，甚至萌生起向自己噴灑「利他素」，親身體驗「利他素」效用的念頭。¹³² 為什麼 36 年前親身結束這場烏托邦實驗的秋雲，36 年後竟然對當年的烏托邦念念不忘？小說有一段值得細味的敘述：

世道變化太快，當秋雲在白河灘上意氣風發地「大煉鋼鐵」時，或在文革中熱血沸騰地「誓死捍衛」時，或在農場對利他主義社會充滿憧憬時，她絕對想像不到今天的拜金狂潮，連她自己也難免隨波逐流。

看看短短 50 年內，中國社會在主流道德上有多麼劇烈的變化，再想想延續 8000 萬年之久的穩定的螞蟻社會，包括它們永恆的道德規範，她真正認識到那種利他社會的可貴。她和顏哲分手時曾對他充滿鄙視，36 年過去，那時的意氣用事慢慢淡漠，她的看法有了變化。¹³³

是什麼導致秋雲對當年的烏托邦實驗產生不同看法？那就是眼下這個「拜金狂潮」的社會：「眼下這個社會，『好人』常常和『無用』劃上等號。」¹³⁴ 「文革」結束後，鄧小平發起的改革雖然帶動了中國的經濟高速增長，但市場化和發展資本主義的結果卻無可避免地造成「拜金狂潮」。當鄧小平為改革開放制定了一個「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目標，¹³⁵ 經歷「文革」壓抑歲月的人很容易將之解讀為：「讓我首先富起來」。閻連科對此深有體會，他曾指出當下中國的唯經濟論造就了十三億人的「致富」之夢與個人私欲主義橫行。¹³⁶ 利

¹³² 同前註，頁 319-322。

¹³³ 同前註，頁 307。

¹³⁴ 同前註，頁 307。

¹³⁵ 鄧小平的原文為「在經濟政策上，我認為要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企業、一部分工人農民，由於辛勤努力成績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來。」詳見鄧小平：〈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載鄧小平：《鄧小平文選·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年），頁 142。

¹³⁶ 閻連科、張學昕：《我的現實，我的主義：閻連科文學對話錄》（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 年），頁 259。

己主義取代了利他主義成為社會主潮，秋雲懷念當日的烏托邦追求，自是可以理解。

事實上，自從鄧小平開展經濟改革後，中國大陸便有一部分自稱「毛派」的人，由下崗工人和知識分子組成，仍舊熱切地崇拜毛澤東，認為鄧小平掌政以後的中國，是對毛澤東時代的背叛。¹³⁷「毛派」的懷舊情感和秋雲相仿；他們依託互聯網網站（例如：「烏有之鄉」、「紅歌會」、「紅旗」等）或微博等新媒體平台，持續宣揚毛澤東思想，不時舉行街頭集會，並對那些批評毛澤東的人發動批判。¹³⁸「毛派」的出現說明了毛澤東當初的烏托邦理想至今依然在民間有巨大吸引力，縈繞不散。中國大陸因為推進市場化和經濟改革而引起的激烈競爭和赤裸的利己主義，成為了毛派懷念「文革」，召喚共產主義烏托邦的絕佳土壤。里斯指出，「經過了令人失望的十年，在天安門廣場上對抗議活動的暴力鎮壓後，毛的形像再次出現，充斥著各式各樣的懷舊、宗教和商業情感。」¹³⁹從這樣的歷史語境出發，王晉康在小說的最後一章描寫步入中老年的秋雲懷念昔日的烏托邦追求絕非偶然，而是對當代中國社會存在的懷緬「文革」現象的曲折反映。

當秋雲向丈夫提出噴灑「利他素」的請求後，高自遠表面上答應了她，暗地裏卻把噴霧器內的「利他素」換成形態和味道相似的液體。¹⁴⁰高自遠這樣做，源於他對烏托邦追求的厭惡：

這種蟻素對「個體」的功效已經不用懷疑。但即使對個體有效，他也不相信基於「善的個體」所創建的「整體」。他很反感那樣的機制——一個獨自清醒的上帝，放牧著一群夢遊狀態下的幸福蟻眾。他既不想成為

¹³⁷ 文濤：〈「毛派」的抗爭〉：<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51015-mainland-maoist/>（查詢日期：2018年8月28日）。

¹³⁸ 2011年經濟學家茅于軾發表了〈把毛澤東還原為人〉的文章後，被「烏有之鄉」網站動員中國大陸各地的「毛派」力量大加聲討。詳見馬立誠：〈當代中國的民粹主義事件〉，《文史月刊》第12期（2012年）。頁78。

¹³⁹ 丹尼爾·里斯：《崇拜毛：文化大革命中心言辭崇拜與儀式崇拜》，頁227。

¹⁴⁰ 王晉康：《蟻生》，頁325。

這樣的蟻眾中的一員，也不想當這樣的上帝。那個姓顏的傢伙實際說得很對，他說「並沒有可靠的機制來持續產生出一個個善的、無私的上帝」，這話說得多好！多清醒！可他偏偏逆天而行，非要扮演這個超出他能力的角色。¹⁴¹

高自遠認為顏哲的所作所為是「逆天以行」，人類必須承認自己的有限性，不應僭越為上帝。再者，他不想放棄自由意志，成為「夢遊狀態下的幸福蟻眾」。高自遠和秋雲相反，他認為顏哲父子鍾情的螞蟻社會雖然 8000 萬年來永恆不變，卻也僵化而沒有發展。反之，本性自私的人類社會卻發展出現在的文明，或許「自私基因才是歷史發展的最基本動力。」¹⁴² 人性本來就由利他和自私自利交織而成，僅僅發揚其利他的一面而排拒其自私自利的面向，最終只會造成人類社會如螞蟻社會一般停滯不前。

高自遠在小說的最後部分才登場，其名字亦可解讀為任何「自有高遠見解」的人。細心的讀者自是不難把握王晉康的用心——任何「自有高遠見解」的人都應該謹記歷史的教訓，警剔任何追求在後毛時期復興共產主義烏托邦的力量。烏托邦衝動是誘人的，但必須加以制止，就像高自遠阻止秋雲重新啟用「利他素」一樣，以免歷史再次誤入歧途。

六、結 語

在後毛澤東時期文學與歷史的互動中，王晉康不是第一個作家以反烏托邦書寫的形式來反思毛澤東時期的烏托邦運動。莫應豐在《桃源夢》（1985）借助烏托邦「天外天」的覆滅來批判「文革」期間凸現的中國文化「深層結構」。¹⁴³ 閻連科《受活》（2003）則對追求共產主義烏托邦造成的人命和經

¹⁴¹ 同前註，頁 325-326。

¹⁴² 同前註，頁 326。

¹⁴³ 鄒文律：〈桃源夢魘——論莫應豐《桃源夢》的「惡托邦」書寫〉，頁 140-153。

濟損失有深刻描繪，主張個體應該成為對烏托邦追求毫無用處之人，才能歸隱至道家的「至德之世」，得享太平和安寧。格非的「烏托邦三部曲」（又稱「江南三部曲」）：《人面桃花》（2004）、《山河入夢》（2007）、《春盡江南》（2011）亦對中國大陸自從晚清以來的烏托邦追求進行一次文學回顧，探討個體生命如何面對撲面而來的烏托邦狂潮。當中《山河入夢》更通過描述一個實現了的共產主義烏托邦：「花家舍人民公社」，剖析及批判當中對個體生命的剝削。這些小說的作者背景都有一個鮮明的共通之處：他們都親歷「文革」，對毛澤東時期的共產主義烏托邦追求有切身體會，而這些體會亦構成了他們日後的創作資源和題材，以及極其一致的反烏托邦立場。《蟻生》在反烏托邦立場上與這些小說並無二致。通過批判各種烏托邦預設，王晉康揭示自視為「神」的烏托邦領袖無法超越人的有限性；暴露遮蔽在烏托邦美好面紗下的「一元論」思維；以及展現了對烏托邦意圖操控人類自然狀態的憂慮。《蟻生》批判的烏托邦預設與王晉康的「文革」經驗相連，達成了對「文革」和烏托邦的雙重反思。

《蟻生》與前述小說顯著不同的是，《蟻生》展現了烏托邦憧憬對經歷過「文革」一代的知識分子而言，既危險，又是極富誘惑力的（秋雲對「利他素」的念念不忘）。即使經歷過「文革」帶來的種種災難和痛苦，面對市場經濟帶來的個體道德淪喪和財富分配不均，主張利他和均平的共產主義烏托邦，再次成為懷念的對像。烏托邦憧憬依然向知識分子不斷招手——這些知識分子也許和顏哲有同樣的想法：毛澤東的未竟之業，只要配合適當的技術手段，必定能夠在我手上得以完成。王晉康藉高自遠提醒讀者，烏托邦憧憬一旦進入現實，勢必壓縮，甚至取消人類運用自由意志的空間。小說展現的這些思考，體現了《蟻生》在中國當代文學的反烏托邦書寫序列中的獨特價值。

《蟻生》的獨特意義還在於它既是科幻小說（擁有鮮明的科學幻想成分），亦深切反思「文革」時期實踐共產主義烏托邦所帶來的災難，以及內在於烏托邦預設的不可克服之處，與《受活》等反烏托邦小說有相通的地方。如果從文學史定位的角度來看，《蟻生》位處中國當代文學反烏托邦書寫，以及中國科

幻文學裏的烏托邦／反烏托邦書寫之交匯處，有其不可或缺的文學意義。誠如本文在前言引述蘇恩文的觀點，科幻小說可以包含烏托邦／反烏托邦書寫的維度；既然如此，那麼中國當代文學在討論反烏托邦書寫時，亦應包括那些被文學界視為科幻小說的作品（例如《蟻生》、《三體》三部曲），始能豐富中國當代文學的論述範圍和層次。

最後，共產主義烏托邦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進程上留下無比深刻的烙印，王晉康以外的中國當代（科幻）作家，怎樣通過文學創作來對此進行反思與呈現？此乃值得研究者日後拓深的方向。

（責任校對：邱琬淳）

引用書目

一、近人論著

* 王晉康：《蟻生》，北京：電子工業出版社，2013 年。

王逢振主編：《詹姆遜文集第 3 卷：文化研究和政治意識》，北京：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 年。

* 王衛英編：《中國科幻的思想者——王晉康科幻創作研究文集》，上海：科學普及出版社，2016 年。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 年。

文 濤：〈「毛派」的抗爭〉，網址：<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51015-mainland-maoist/>（查詢日期：2018 年 8 月 28 日）

衣俊卿：《歷史與烏托邦：歷史哲學：走出傳統歷史設計之誤區》，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5 年。

沙媛媛：〈《蟻生》：一部反烏托邦的寓言〉，《文學教育（上）》第 8 期（2013 年）。

* 李澤厚：《中國現代思想史論》，臺北：三民出版社，1996 年。

- 吳曉東：〈中國文學中的鄉土烏托邦及其幻滅〉，《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43 卷第 1 期（2006 年）。
- * 何冠驥：〈幸福保證的謊言——論烏托邦的真面目〉，載何冠驥：《借鏡與類比——中國文學研究的現代化》，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9 年。
- 林蘊暉，《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 4 卷：1958-1961。烏托邦運動：從大躍進到大饑荒》，香港：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8 年。
- * 陳周旺：《正義之善——論烏托邦的政治意義》，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 年。
- 陳楸帆：〈悲憫的人性觀察者——著名科幻作家王晉康專訪〉，《世界科幻博覽》第 8 期（2017 年）。
- 陳雀倩：〈烏托邦構設的真實與失落——論格非《山河入夢》之意義〉，《人文社會與醫療學刊》第 1 期（2014 年）。DOI:10.6279/JHSSM.2014.1(1).07
- * 馬立誠：〈當代中國的民粹主義事件〉，《文史月刊》第 12 期（2012 年）。
- 姬志海：〈論《江南三部曲》的「烏托邦」反思〉，《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第 3 期（2017 年）。
- 陶東風：〈阿倫特與當代中國問題〉，《學術界》第 207 期（2015 年）。
- 張頤武：〈主流化進程與想象的重構：科幻文學與當下中國〉，《山花》第 19 期（2015 年）。
- 黃英偉：〈工分制的制度經濟學分析〉，《二十一世紀》（2012 年 6 月號，總 131 期）。
- 鄒文律：〈桃源夢魘——論莫應豐《桃源夢》的「惡托邦」書寫〉，《中央大學人文學報》第 47 期（2011 年）。DOI:10.29905/JCUT.201107.0004
- 鄒文律：〈逸出烏托邦之外——論閻連科《受活》的反烏托邦書寫〉，《中國文學學報》第 8 期（2017 年）。
- 楊伯峻譯注：《論語譯注》，臺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2 年。
- 趙海虹：〈王晉康——中國科幻的思想者〉，收錄於王衛英編：《中國科幻的思想者——王晉康科幻創作研究文集》，上海：科學普及出版社，

2016 年。

蔡英文：《政治實踐與公共空間——漢娜·鄂蘭的政治思想》，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2 年。

鄧小平：《鄧小平文選·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年。

劉志榮：〈當代中國新科幻中的人文議題〉，《南方文壇》第 1 期（2012 年）。

劉劍梅著，杜紅譯：〈徘徊在記憶與「坐忘」之間〉，《當代作家評論》第 1 期（2008 年）。

閻連科、張學昕：《我的現實，我的主義：閻連科文學對話錄》，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 年。

* 謝江平：《反烏托邦思想的哲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技出版社，2007 年。

* 錢理群：《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1949-2009）：另一種歷史書寫（下）》，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3 年。

（英）托瑪斯·摩爾（Thomas More）著，戴錙齡譯：《烏托邦》，臺北：志文出版社，2005 年。

*（美）宋明煒（Mingwei Song）著，王振譯：〈1989 年以後：中國科幻新浪潮的烏托邦變奏〉，《中國現代文學》（2016 年 12 月號，總 30 期）。

（美）麥克法夸爾、（瑞典）沈邁克（Roderick MacFarquhar & Michael Schoenhals）著，關心譯：《毛澤東最後的革命》，臺北：左岸文化公司，2009 年。

*（美）莫里斯·邁斯納（Maurice Mesiner）著，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譯：《毛澤東與馬克思、烏托邦主義》，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 年。

（美）莫里斯·邁斯納著，杜蒲譯：《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05 年。

（美）拉塞爾·雅各比（Jacoby Russell）著，姚建彬等譯：《不完美的圖像——

- 反烏托邦時代的烏托邦思想》，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 年。
- （美）邁可·桑德爾（Michael J. Sandel）著，黃慧慧譯：《反對完美：科技與人性的正義之戰》臺北：博雅書屋，2013 年。
- （德）卡爾·馬克思（Karl Marx）著，何思敬、徐冰譯：《哥達綱領批判》，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年。
- （德）卡爾·曼海姆（Karl Mannheim）著，姚仁權譯：《意識形態與烏托邦》，北京：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 年。
- （德）丹尼爾·里斯（Daniel Leese）著，秦和聲等譯：《崇拜毛：文化大革命中心言辭崇拜與儀式崇拜》，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17 年。
- （義）托馬索·康帕內拉（Tommaso Campanella）著，陳大維、黎思復、黎廷弼合譯：《太陽城》，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 年。
- Ban Wang, *The Sublime Figure of History: Aesthetics and Politic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 Daniel Leese, *Mao Cult Rhetoric and Ritual in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 Darko Suvin, *Metamorphoses of Science Fiction: On the Poetics and History of a Literary Genre* (Oxford: Peter Lang, 2016).
- George Woodcock, "Utopias in Negative," *Sewanee Review*, 64 (1956).
- Hannah 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New York : Schocken Books, 2004).
- Isaiah Berlin, *The Crooked Timber of Humanity: Chapter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3).
- Krishan Kumar, *Utopianism*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91).
- Mingwei Song. "Variations on Utopia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Science Fiction," *Science Fiction Studies*, 40 (2013). DOI:10.5621/sciefictstud.40.1.0086
- Paul Tillich, *Political Expectation*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1).
- （說明：書目前標示*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Selected Bibliography

- Chen, Z.-W. (2003). *Zhengyi zhi shan: lun wutuobang de zheng zhi yi yi* [The goodness of justice]. Tianjin: Tianjin Ren-Min.
- He, G.-J. (1989). *Xingfu baozheng de huangyan: lun wutuobang de zhenmian mu* [A fairy tale of happiness guarantee: on the true colors of utopia]. In G.-J He (Ed.), *Jiejing yu leibi: zhongguo wenxue yanjiu de xiandaihua* [Take examples and analogy: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research]. Taipei: Dong-Da.
- Li, Z.-H. (1996). *Zhongguo xiandai sixiang shi lun*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thought]. Taipei: San-Min.
- Ma, L.-C. (2012). *Dang dai zhongguo de mincui zhuyi shijian* [Contemporary Chinese populism events]. *Historical Monthly*, 12, 77-79.
- Maurice, M. (1991). *Marxism Maoism Utopianism* [Mao Zedong yu Makesi, utuobang zhuyi].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Literature Research Center (Trans.). Beijing: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Literature Research.
- Qian, L.-Q. (2013). *Mao, Z.-D. shidai he hou Mao, Z.-D. shidai (1949-2009): ling yizhong lishi shuxie* [The Times of Mao Z.-D. and The Times of post-Mao Z.-D.(1949-2009): another kind of writing in history] (Vol. 2). Taipei: Linking.
- Song, M.-W. (2016). “1989 Nian yi hou: zhongguo ke huan xinlangchao de wutuobang bian zou” [After 1989, variations on utopia in the New Wave of Chinese science fiction]. Z. Wang (Trans.).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Studies*, 30, 61-78.
- Wang, J.-K. (2013). *Yi sheng* [The ant of life]. Beijing: The Electronics Industry.
- Wang, W.-Y. (Ed.). (2016). *Zhongguo kehuan de sixiang zhe: Wang J.-K. ke huan chuang zuo yanjiu wen ji* [The science fiction thinker of China: Wang. J.-K’s writing in science fiction research collection]. Shanghai: Popular Science.
- Xie, J.-P. (2007). *Fan wutu bang sixiang de zhexue yanjiu* [Philosophy studies of anti-utopia]. Beijing: The Society of Technology in China